

四端七情之辨

Siduan Qiqing Zhi Bian
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

洪军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四端七情之辨

洪军 / 著

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

Siduan Qiqing Zhi Bian



人
文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钟金铃 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洪军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ISBN 978 - 7 - 01 - 019302 - 1

I. ①四… II. ①洪… III. ①朱熹(1130—1200)—理学—研究—朝鲜
IV. ①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2789 号

四端七情之辨

SIDUAN QIQING ZHI BIAN

——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

洪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302 - 1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一

“《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做学问就是把骨头、象牙、玉石、石头加工成器，要下切、磋、琢、磨的苦功夫。洪军博士后研究韩国哲学有年，又得精通韩语之利，故能对韩国哲学思想有致精微的体认。朝鲜朝人杰地灵，学术繁荣，出现了相似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其学派林立，凡义理派、事功派、节义派、主理派、主气派、礼学派、图说派、实学派以及以地域分的畿湖派、岭南派等，不一而足，各学派之间互相切磋、琢磨、论争、答辩，对中国儒学经典、朱子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大大推动了学术思想、哲学理论思维不断深入发展。各派哲学思想在论辩中不断得到修正、充实、完善，使中国儒学思想、朱子学在与朝鲜传统文化思想的融突而和合中，造就了朝鲜儒学和朝鲜朱子学。从朝鲜半岛哲学思想发展史而观，朝鲜朝是朝鲜半岛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期，也可谓“造极”期。

该书从朝鲜朝各哲学思想家的原典出发，避免现有的先见、先识或囿见、固见，以体识、体认各哲学思想，并出入于原典之间，探究其人文环境、思想演化、论辩激发、经典诠释中的思想关联，故能较为贴近各哲学思想家的原意、本意。

概而言之，该书具有核心话题的明确性，逻辑系统的清晰性，思想比较的异同性，独具匠心的创新性。

核心话题的明确性。哲学，换言之是一种辩学，辩论、对话、争鸣出智慧。辩论、对话、争鸣是爱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辩论、争鸣中激励智慧的闪光。无论是古希腊，抑或中国先秦，都是高扬辩论、对话、争鸣的时代。在百家争鸣

中，才有百花齐放。在朝鲜半岛哲学思想史上朝鲜朝也是辩论高涨的时代，历经无极太极论辩、四端七情理气论辩、四七人心道心论辩、人物性同异论辩以及心说论争等。它观照性理学的本体论、社会论、人生论、价值论、体认论、理气论、心性论、道器论等，造就了朝鲜朝哲学思想独特的理论风格、思维形式、范畴体系、诠释方法。特别是对理、气、心、性、无极、太极、人心、道心、人性、物性等概念、范畴的明确规定、深度辨析、比较研究，均具有鲜明的特色，显性的神韵。在这些诸多论辩和概念、范畴的融突中，又以“四端七情”论辩为核心话题，不仅围绕此核心话题为线、为纲，把其他诸多论辩统摄于此核心论辩，而且随此核心话题使论辩渐渐深入展开，概念、范畴的外延不断延伸，内涵不断充实，使核心话题趋于完整。

逻辑系统的清晰性。哲学思想逻辑系统把哲学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依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构成一定关系的整体系统。中国古代和古希腊都有整体论和系统论思想，如德谟克利特的《宇宙大系统》（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等，中国的《周易》的六十四卦系统、《老子》的逻辑思维系统等。当代系统科学家普利高津对中国古代系统思想曾说：“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这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①尽管古代整体论或系统论是直观的，但对于世界的整体关系的体认有了提升。该书揭出权近的《入学图说》共四十图说，其中以《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大学指掌之图》、《中庸首章分释之图》、《语孟大旨》、《五经体用合一之图》等对“四书五经”的内容分析、综合，既把研究对象还原为更深层次的元素，又把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元素（即概念、范畴）经判别、分类、归纳、演绎而构成整体系统的哲学逻辑结构。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是依周敦颐的《太极图》及朱熹的《中庸章句》之说，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上而太极，最上一圈，分阴阳东西，内圈为《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以此图统率诚字圈、敬字圈、欲字圈，其下禽兽，横者尤偏塞为草木，万物化生之亦具于其中。由此构成整体系统的清晰明白的逻辑结构。权近的四十图说，对后来郑之云的《天命图说》、李滉的《圣学十图》、李珥的《心性情图》、《人心道心

^① 普利高津：《从存在到演化》，《自然杂志》第3卷第1期，第415页。

图》及曹植的《学记图》产生重要影响。以图示说,以说释图,两者融突和合,开启了朝鲜朝以图说体现作者哲学理论思维的形态的图说派,亦体现了朝鲜朝哲学理论思维特殊表达形式。尽管以往在韩国没有提出“图说派”之说,但以言简意赅的形式表达哲学理论思维形式,既体现了朝鲜朝哲学理论思维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亦体现了朝鲜朝哲学理论思维的简洁精神和殊性特色。

思想比较的异同性。在哲学理论思维研究中,比较是对研究对象的体认的深化,通过比较既是研究问题的展开,亦是对研究问题的索隐。比较有纵向的、横向的比较,有同类的、异类的比较,使研究的问题更能精准地把握,使研究对象的文本的诠释更加符合本意。“四端”原出于《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①“七情”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见于《礼记·礼运》篇。权近的《入学图说》较早提出“四端”与“七情”的关系,开朝鲜朝“四端七情”之辨的先河,后来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等都接着“四端七情”讲,而各抒己见。权近是郑道传的弟子,两人在理解、阐释朱子学的侧重上有异,郑道传致力于实践朱子学,以批判佛教思想,为朱子学的传播和学习清除障碍。权近倾心于对朱子学理论的探讨与诠释,以“理”的“其尊无对”批判佛教思想,树立理本体的权威。导致“理气四端七情”之辨延续几百年的直接原因是李滉对郑之云的《天命图》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的修改。李滉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这一改便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论争。奇大升首先对李滉发难,他以“四端七情”的“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的“理气浑沦”论,与李滉“理气互发”论相对待。奇大升以为,理气虽有分,但在事物上,两者浑沦不可分。李滉在与奇大升的辩论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表述方式,初:“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其次:“四端之发纯善,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终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尽管有三变,但主旨仍为“理气互发”论,没有变。继李、奇两氏之后,诸多学者接着辩论纷纭,李珥既不同意李滉理(四端)气(七情)互发说,也不同意奇大升的理气浑沦说,而主张“气发理乘”

^① 《公孙丑上》,《孟子集注》卷3,《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说。他认为：“大抵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无先后、无离合，何谓互发也。”但李珥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受到成浑的诘难。成浑认为“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同意李滉的观点，这使李珥不得不将“四端七情理气”之辨引向深入。成浑、李滉理气互发论便引向人心道心之辨，从人心道心之辨以证理气互发论。李珥则坚持“气发理乘”论，并以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此所谓气发，恻隐为气，其本为仁，“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说明无论从人心而言，抑或从天地之化而言，都证明气发理乘为正道。

理气四端七情论辩，自然而然涉及心性论、道心与人心、天地之性（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话题。道心与人心话题始见于《尚书·大禹谟》，作为先圣的“十六字心传”，受宋明理学家的关注和论辩^①。明中叶罗钦顺提出“道心为性，人心为情”，引起朝鲜朝性理学者热议。李滉以人心为本，人欲为流。道心为义理之心，原于性命之正。注重道心人心之差分，李珥则注重两者之联结。尽管道心为“义理之心”，是至善的，为圣人所具有的心，出于性命之正，四德四端之心等，为朱熹、李滉、李珥所认同。但李滉在道心的追根溯源、道心的范围限定上有异于朱熹，李珥从道心人心不可分，说明道心与人心为善恶的总名，又与朱熹、李滉差分。三人理解有异，因此开出不同的面向。从比较异同中，不仅可加深对文本话题的理解，而且可更深层次体认论辩的价值与意义。

独具匠心的创新性。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是思想的基因，日新，日日新，苟日新乃是普适的真理。创新才能发展，创新才能战无不胜；创新才能共赢，创新才能生生不息。朝鲜朝的朱子学由于其不断开展论辩、对话，才呈现生气盎然，而开出新生面。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说：“通过对话，人类取得了最大成就，因为不对话，人类遭遇了最大失败。本来不必如此的。我们最大的希望可以在未来成为现实。有了任我们支配的技术，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确保我们保持对话。”^②作为对话一种形式的论辩，是取得

^① 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朱熹思想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

^②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3月14日文章，题为《斯蒂芬·霍金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看法》，作者：布兰登·斯佩克托。《参考消息》2018年3月16日转载，题为《霍金更新人类“宇宙观”》。霍金于2018年3月14日去世，享年76岁。

朝鲜朝性理学最大成就的现实,它造就了性理学逻辑的精微性,思维的深刻性,品格的独特性,形式的图说性,其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而开出朱子学的新生面,使朝鲜朝儒学、朱子学在东亚儒学史、朱子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这是我喜读洪军博士《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的体会,该著对“四端七情”之辨考镜源流,纵横比较,探赜索隐,诸多创新,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著。

是为序。

张立文

2018年3月1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序二

东亚儒学研究是近年来儒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诸多新的理论动向之一。在东亚文化、东亚思想越来越受到世人瞩目的今天,如何对曾经在东亚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儒学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是东亚学人共同面临的课题。

洪军博士长期从事韩国哲学思想及东亚儒学的比较研究。尤其在中韩性理学比较研究方面,科研成果突出。洪军博士近来完稿的《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是作者在中外有关中韩“朱子学”研究的基础上,以中韩朱子学比较及东亚儒学发展史的视角系统探讨“四端七情”之辨的理论问题的,在中国学界是不多见的,亦可谓独辟蹊径的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

作者从原典资料入手,考察了朱子学在韩国本土化以及在东亚多元发展的过程。比较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贯穿了论著的始终,有层次、多视角、有新意。本书在国内开辟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中韩儒学比较研究的新领域。

全书以“四端七情”问题为论述主线,考察了朱子学在韩国的容受以及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内容主要由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朝鲜朝初期的朱子学、郑道传的斥佛论与朱子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以及朝鲜朝前期朱子学之发展等,重点讨论和分析了以李退溪与奇高峰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和李栗谷与成牛溪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的四端七情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理论特点,并对其影响也作了详细论述。最后作者还从东亚儒学发展史的意义上,对韩国儒者所关注的“四端七情”论、“人心道心”论及其理论意义

作了深度探讨,亦着重阐发了韩国性理学的理论特色以及与中国朱子学的差异等问题。

作者以为,自高丽末开始传入到韩国的朱子学,至16世纪经由李退溪、奇高峰、李栗谷、成牛溪等性理学家们的传承与发扬,在韩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并形成了以“主理”为特征的岭南性理学派和以“主气”为特征的畿湖性理学派。他们的理论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两派之间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而展开的论辩,还使韩国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探讨为中心的哲学轨道。

全书引用资料翔实,论述层次分明,线索清晰,文字流畅,吸纳了不少韩国和中国、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今天,相信本书的出版,会进一步推动国内正在兴起的东亚儒学比较研究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深层次意义上的人文交流的开展。

潘富恩

2018年3月13日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目 录

序 一	张立文	001
序 二	潘富恩	001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一节 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		002
一、安珦		002
二、禹倬		004
三、权溥		005
四、白颐正		005
五、李齐贤		006
第二节 丽末鲜初的朱子学		008
一、李穑		008
二、郑梦周		011
三、吉再		014
第三节 郑道传斥佛论与朱子学“官学”地位之确立		016
一、郑道传的性理说		017
二、郑道传的斥佛论		023
第二章 朝鲜朝前期朱子学之发展		029
第一节 金时习的太极论		029
一、太极说		030

二、道佛观	032
第二节 赵光祖的道学论	034
一、至治主义	036
二、性理说	040
第三节 徐敬德的气本论	044
一、太虚说	044
二、先天说	047
三、“二化一妙”论	048
第四节 李彦迪的理本论——以“无极太极”之辨为中心	051
一、论辩的发端	052
二、论辩的主要内容及理论特点	058
三、论辩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069
第五节 曹植的性理学	072
第三章 四端七情论辩之产生与发展	077
第一节 四端七情论辩之发端——以权近、柳崇祖的“四端七情”说为中心	077
一、权近与其“四端七情”论	077
二、柳崇祖与其“四端七情”论	091
第二节 李滉与其“四端七情”论	096
一、李滉的理气论	096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兼论郑之云的《天命图》与“四端七情”论	103
三、李滉的主敬论——以《圣学十图》为中心	116
第三节 奇大升与其“四端七情”论	127
一、奇大升的理气论——兼述《论困知记》	127
二、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与李滉“四七”论之比较为中心	143
三、奇大升“四端七情”论的特色	156
第四节 李珥与其“四七人心道心”论	165

一、李珥的“理气之妙”论——与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之 比较为中心	166
二、李珥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与成浑“四七人心道心” 之辨为中心	178
三、李珥“四七人心道心”论的特色	189
第四章 四端七情论辩之影响	196
第一节 宋浚吉与其“四端七情”论	196
一、宋浚吉的理气论	196
二、宋浚吉的“四端七情”论	204
三、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论	209
第二节 宋时烈与其“四端七情”论	214
一、宋时烈的理气论	214
二、宋时烈的“四端七情”论	219
第三节 丁时翰与其“四端七情”论	225
一、丁时翰的理气论	226
二、丁时翰对李珥“四端七情”说的批判	230
三、丁时翰的“人心道心”论	233
第五章 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四端七情”论及其意义	237
第一节 “四端七情”之辨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以李滉 与李珥的理论差异为中心	237
一、四端七情论辩的发生及其理论渊源	238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	241
三、李珥的“四端七情”论	247
四、李滉与李珥“四端七情”论差异之分析	251
第二节 “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儒学史上的意义——以朱子、 罗钦顺、李珥的理论为中心	256
一、朱子的“人心道心”论及其理论意涵	256
二、罗钦顺的“人心道心”论	260
三、李珥的“人心道心”论	264

四、“人心道心”之辨在 16 世纪东亚思想界的多元发展 269

主要参考文献	271
附录一 当代中国的韩国哲学研究	277
附录二 晦·忘无极太极论辩——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及 答忘机堂书	345
索 引	356
后 记	362

第一章 緒論

儒学思想产生于 2500 多年前的东周时代,其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他把“仁”作为儒学的核心理念,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后经由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历代儒学大师的补充与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主干。同时又传播至域外,如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各国,在东方形成了以汉字及汉文典籍为媒介的儒家文化圈。尤其是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东亚,“独尊朱学(朱子学)”曾蔚为风尚,形成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东亚儒家文化圈”。

在东亚文化圈中受儒学思想影响最深、最广的国家无疑为韩国。对于韩国儒学,学界有过精辟论述。“何谓韩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一些对韩国历史和文化了解浮泛的人认为,韩国儒学就是中国儒学的移植和翻版。此言误矣!固然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学就是以孔子为首的儒者的学说及其思想的总汇。同时应该看到儒者的学说和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随着时势的需求而丰富。由此,儒学才能够像一棵长青之树,像一条湍流不息的长河,永葆青春,永不枯竭。”^①诚如斯言,儒学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后便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历程,这种带着民族文化之烙印的儒学就不再是中国儒学的简单移植和翻版,而是具有独立性的“韩国儒学”抑或是“韩国儒教”。

韩国儒者以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逻辑思辨,使儒学在传统的东亚思想世界里发生了重要变化,演变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学”。朝鲜王

^① 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朝(1392—1910年)开国后,朱子学迅速升格成国家意识形态之主流,遂为此后朝鲜朝五百年的官方哲学。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今天,作为东亚儒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的韩国儒学也将会更加彰显其理论价值与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对高丽末期和朝鲜朝开国之际朱子学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朱子学传入之初的主要人物间的传承系谱的研究^①,而对其义理流衍的理论特点关注不足。

本章拟由朱子学在丽末鲜初的传播发展之考察来论述早期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义理特点。

第一节 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

高丽朝后期从武臣执权时起,文教即进入衰落期,至13世纪末整个社会已呈斯文扫地之衰相。此时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新进士类”通过科举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影响王朝政治的一股新兴势力。他们企图从元朝引进程朱理学(朱子学)以重拾社会秩序,进而挽救国家的命运。不过,朱子学的输入还与当时元朝社会思想之状况密切相关。元代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把朱子学定为官方哲学,还将与之对立的陆九渊心学列入另类,致使陆学只能流传于我国江南民间。因朱子学在元代思想界享有独尊地位,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高丽新进士类引进之首选。^②这一特征在韩国思想界影响甚远。它一方面使朱子学成为此后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官方哲学,另一方面却影响和阻碍了陆王一系的心学思想在韩国的传播。

一、安珦

据史书记载,朱子学是高丽忠烈王时由安珦从元朝引入。^③朱子学虽有

① 学界对韩国早期的朱子学传承系谱的主要研究著作有:崔英成:《韩国儒学通史》(上),首尔:simsan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622页;琴章泰:《朝鲜前期的儒学思想》,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8页;李胜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214页等。

② 参见李胜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7页。

③ 金忠烈先生认为,朱子学传入韩国时间为忠烈王十六年(1290年)。(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史》,首尔:艺文书院1998年版,第354—355页)

“新儒学”、“宋学”、“程朱学”等不同称谓,但其内容则基本相同。^① 安珦(字士蕴,号晦轩,1243—1306年,朝鲜时代改称为安裕)为兴州(现今顺兴)人。作为高丽朝后期的儒学大家和教育家,被后世尊为韩国性理学的始祖。《高丽史节要》记载其为人庄重安详,在相府能谋善断,常育人才而以兴复斯文为己任。他是高丽忠烈王的宠臣,历任尚州判官、儒学提举、集贤殿大学士、金议中赞等官职。1289年高丽朝设置儒学提举司,安珦被任命为首任“本国儒学提举”。是年他扈从忠烈王入元,在滞留元大都(燕京)期间始得《朱子全书》,知其为孔门之正脉。遂手录其书,并摹写孔子和朱熹画像而归。这其实为此后朱子学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归国后安珦讲究朱子之书,深致博约之功,努力传授朱子学。“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②他常以兴学育才为己任,“蓄儒琴一张,每遇士之可学者劝之”^③。而且,安珦还曾随世子(忠宣王)来过元朝,再次目睹了文教在元朝社会的隆盛状况。

但是,彼时的高丽朝儒学与佛、老思想的盛况相比则呈现一派衰败之势。对此安珦曾作诗慨叹道:“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④这是安珦描绘当时的国子监文庙败落景象的一首诗。

为了重新振兴儒学和恢复荒废的儒学教育机构,他建议朝廷设置“赡学钱”。安珦以为“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⑤,兴学养贤的目的就在于传授孔孟之教,推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他还曾派博士金文鼎等入元,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等回国。他还荐举李忬、李瑩等人为经史教授都监使,于是“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指国学七斋与私学十二徒——引者注),横经受业者动以数以百计”^⑥。安珦认为朱子发明圣人之道以攘斥禅佛之学,其功足以配仲尼。因此欲学仲尼之道,必须先学晦庵之学。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朱子学开始在高丽社会得到重视。安珦另一功绩是培养出了众多鸿儒硕学,

^① 参见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9页。

^② 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③ 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④ 《题学宫》,《遗集》,《晦轩实纪》卷1,韩国全南大学校出版部1984年版,第204页。

^⑤ 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⑥ 郑麟趾等:《安珦》,《列传》卷18,《高丽史》卷105,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